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四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4d)

【史海钩沉】 周恩来处理武汉“7. 20”事件(下) 徐 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周恩来处理武汉“7. 20”事件(下)

• 徐 明 •

三、7月18日周恩来讲了什么？

周恩来所讲的精神，就是中央当时准备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从当时形势背景和正在解决中的河南、湖南问题看，原则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出现后来的“7. 20”大规模反弹，即便组织两派群众代表座谈，中央最后下达的文件精神也将是如此；在发生“7. 20”反弹之后，除改组军区领导班子外，中共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精神也未发生根本变化。文革十年里，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最大的遗憾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讲话提纲，去研讨这个讲话提纲。大家往往是在并不明了（或者掩盖，或者歪曲）当时中共中央实际意图的情况下，回避当时的实际背景，去认识和判断历史事件的，而且人云亦云、辗转炒作。这样，实质上不是维护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形象，而是严重扭曲了历史和周恩来，也绝对不利于认识和反思文革问题的实质及其深刻教训。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23），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24）形势表面稳

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25），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26），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27）。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28）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影响，这一主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29），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中生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按：指武汉的造反夺权运动实际和群众冲突里的文件），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按：指武汉军区对形势的声明和取缔工人群众组织的公告），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30）。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31）。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32）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33）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34）。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35）。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36）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37）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38）

（该讲话录音整理稿辑入《口述“7·20”》，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6—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撇开价值、是非判断的争议，从事物的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要谢、王澄清的正是其最主要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7月21日在武汉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冈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39）7月25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7月26日，在中央常委会批判陈再道时，周恩来谴责“7·20”事件是“叛逆行为”。

肇事者在19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实质并非王力自由散漫“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而是王力“私自”透露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朋友们不愿相信的声音。在当时已经公开身份出现于武汉社会的，也仅仅是王力此清高气盛的“知识分子”适合公开反对痛打，借机发难而已；反抗和抵制中央文革激进文人的思潮，在谢、王抵汉以前早就客观存在，王力透露中央精神之前，武汉就已流传王力个人的流言蜚语，诸如说王力是刘少奇的人，是“二月提纲”的黑笔杆子，甚至独立师的牛怀龙师长说省公安厅刚刚查出王力是国民党党员……皆非空穴来风。

周恩来在作了这一报告之后，带领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听取毛泽东谈话后，当晚就离汉返京。具有非常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未能估计到的是：1、就在他离开武汉以后，当晚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就在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同意下开始传达这个讲话主要精神，次日传达到排级、战士，部队开始出现骚动，就有指战员去军区造反；2、下半夜，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群众中发表激情的倾向性讲话，表达了中央对造反派的支持，录音于次日在武汉三镇播放，加剧“百万雄师”群众的反弹；3、更为严重的是，在19日晚，就有个别人又向“百万雄师”头头，透露毛泽东就在东湖，要他们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东湖的消息是绝密的，仅仅是军区主要领导和负责安全的武空副司令刘丰知道）这是任何时代的各届党中央与拥护中共的一切干部群众，至今基本不知道的秘密隐情。

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在这些人自以为是“善意的”挑动下，头脑狂热地冲击

了武汉军区，又冲击毛泽东与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并在军区批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

四、事件当天

周恩来已于7月18日深夜离汉返京，19—20日武汉时局剧变，周恩来并不在现场。所以，谢、王到水院讲话，8201部队将他的讲话要点向全师传达、战士与百万雄师群众去军区要求澄清讲话——冲击东湖宾馆，甚至揪斗王力、对周不满等等，他都不可能预先估计到。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紧急碰头，湖北方面杨成武的急电也打到会场，告知武汉情况；周即告杨根据情况可以将毛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决定安排一下马上飞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及对策，周后也赶到。今天众多文章皆称在该次会议上林彪定调“7·20”是反革命暴乱，但根据不足，林彪秘书张云生就提出异议。周恩来立即赶回武汉，劝毛转移。看来，这既是会议的决定，恐怕更是周的决定，他被武汉时局的变异，也为自己没能如愿化解武汉问题、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而震惊。张云生《毛家湾纪实》说，当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大约一小时左右，会议散了。叶群来到秘书值班室……作应急式的布置。”叶说“……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毛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张的记述是准确的，叶群的话也说到当时实情，确实是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这些，从后来披露的他的系列言行也有所证实。今天研讨“武汉事件”及当日的会议，似应倾向于当时所有的中央领导人，至关担心的首先是毛泽东的安危。

《东湖风云录》里引用的邱会作的回忆是可以作一个参考的：“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马上离开武汉。……总理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提议林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派部队赶赴现场。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总理和邓大姐决定都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林彪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和总理磋商，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劝毛速离武汉，并派我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40）

对于当时中央在武汉和北京的众人来说，武汉情况极不明朗，几乎是风声鹤唳。所以出现粟裕在27日中央军委传达当时揭发的事：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抵汉消息，……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

今天心平气和地说，陈是没有企图和胆量扣留周恩来的，他见事闹大控制不住，迎接总理（这次也直接通知了军区）希化被动为主动，看周去善处乱局吧。秘书的揭发也是事实，即陈的思想极其不通，对周18日的意见，实在是不服，现在军队和群众乱起来了，看你周恩来怎么办？还不是和王力一样被动！这点也被毛、周识破，所以毛泽东不同意周在武汉召集军区与群众代表谈话：“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微行》）至于“百万雄师”人员聚集机场，从《口述“7·20”》看，是8201部队的蔡政委通知来“向周总理告状”的，他的原意也不过是以群众压总理，要求重新表态而已。“百”派的意见和问题，在此前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激愤的群众要求总理接见，倾听他们的声音，自然也在情理

之中。见周的专机并未到汉口，集聚人群也就散去，此时，周恩来已在武昌县山坡军用机场着陆。

随同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说（41）：“毛主席可能有危险，不然怎么叫周总理亲自去武汉还带了部队！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按：张瑞霭）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周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起飞约40多分钟，约在信阳空境）机长报告武汉市已经贴出欢迎标语，而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满载“红卫兵”的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后，周首先要通刘丰电话问讯情况，刘后从王家墩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后飞还王家墩，天黑后由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据当时在山坡机场7333部队同志的追忆：周到达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儿有电话吗”？说“中央很关心武汉情况，要去武汉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候机室，周电话询问军区和宾馆：“谢副总理、王力在那里？他们现在安全怎样了”？（42）张佐良医生说天黑以后，“周恩来换上便服，戴上墨镜”，赶去东湖；据多人回忆，周是在王家墩机场通知飞机可以降落后，下令全体登机，才在王家墩降落，待天黑后乘吉普车到武昌的（周居然采用了白区工作的方法，可见当时也做了多种准备）。晚上，张根成见到周恩来戴黑眼镜穿军装进入百花一号，立即与杨、谢、李、汪、余商量确定安全转移毛泽东的办法，旋即去毛处，劝毛转移。毛泽东同意了当晚乘专机去上海。武空警卫部队、空15军著名的黄继光英雄连（上甘岭特功八连，由3营的杜教导员率领）和部分在东湖的8341部队指战员，直接承担了当晚护送毛泽东去汉口机场的任务。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具体指挥和配合了转移行动。

下半夜周从主席处回来，并带回原驻在梅岭的一个小分队8341指战员，加强百花一号院的警戒（当时北京来人已全部集中在一号），可见已经将毛送离东湖（周从北京带来的两个中队8341留在汉口机场专线备用）。而且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45师的两个团业已赶来武汉执行警备任务。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张根成那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而且，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周恩来20日再次赴汉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东湖风云录》，P250）

另按专机机长王进忠回忆，在20日下午5点后，载满8341军人的专机随总理专机在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亲自命令“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到天黑后，专机再飞到王家墩机场着陆，见到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232号专机，很快，潘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按此回忆，由于究竟是天上走还是从地上离开方案未最后敲定，所以空军专机始终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不过毛泽东可能使用的专机已由余立金初选确定。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地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并具体组织落实。这点今天鲜为一些回忆所披露。（《东湖风云录》，P252—255）

送走毛泽东后，周亲自组织平息武汉事端，组织找回被“百万雄师”揪走又失踪的王力；对照多种记述，全过程即由李作鹏、余立金出面与在汉海、空军单位做工作，稳定局势，安排保护和转移毛泽东；总理亲自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处理问题，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

为力（当时“百万雄师”不听、8201不听，8199也不听陈司令指挥）；周又通过武汉军区其他领导（孔、叶）做工作，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43）周恩来到武汉后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人。到21日黎明前，仍无王力消息；早上，他焦急地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到王力。对周恩来而言，现在并不单单是王力个人安危，而是涉及中共中央整体的权威性。

在总理和三军领导的指挥下，武汉周围的空15军，奉武空的命令紧急调派入城，实施紧急戒备任务。或许到此时，谢富治才终于明白，在14日时，周恩来为何笑他忘了武汉驻军曾经是他率领过的一部。（显然，武汉地区的部队调动，并非北京的林彪指挥的）

王力自己对这一段的记述也是确实的：“总理赶回武汉……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主席。当时主席的住所（按指梅岭，不过8341的警卫干部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梅岭二号、三号游泳池和密切警戒周围的小丘、树林，冲进来的人群未曾靠近梅岭一号）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按：紧靠省博物馆）转移到机场，改乘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44）

最近见另一纪实《政治漩涡中的杨成武》转抄陈再道的回忆说：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而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一传闻近年屡见。不过当时盛传的总理从北京有电话打到武汉，要部队与“百万雄师”去人商议解决问题，时间大致是在20日的上午，周在北京得知出事的时候，不是“一到武汉”。20日中午，军区叶明副政委曾指示8199部队的张政委向揪斗王力的“百万雄师”头头传达总理指示：“每派均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商谈解决武汉问题”。话刚说完，不料其中一个头头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45）而且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被抓到8201师部，也听见独立师有干部大叫“去北京干什么，就在武汉可以谈，让周恩来陈伯达来谈”。抵制周的群众和部队干部，当时的对策和认识，完全是一致的。孔庆德口述成书的《一代将星孔庆德》也讲：周恩来对他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100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

笔者分析，周到武汉的中心紧急任务，就是转移毛泽东，带走谢、王一行；即便有重新谈判的想法，也不至于“一到武汉”就顾得上。考虑到武汉问题没有如外地那样，先前叫各派充分发表意见，所谓“保守派”的意愿更未充分表达，有人也提出再找群众会谈，他即便有重新谈判解决问题的念头，甚至在开始设想请武汉人进京会谈，但在到达武汉之后，面对武汉实际，特别是肇事群众与部队，根本不领情，公开抵制周恩来的建议与指示；他权衡解决方案，也不会顶毛、林之意，自己安排组织两派和军区去京谈判，再煮武汉的这大锅已经特别夹生的米饭；所以，到21日，周与武汉军区，没有再定此事。

《微行》披露，21日，武汉消息汇报到上海，说周“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但毛泽东不同意，“还是早点离开好”。况且，在7月20—21日，任何中央领导，在会上设想种种方案均可以，但不会在集体研究之外，忙乱里个人公开出首，再出此策；22日深夜周主持研究召陈、钟一干人到京，并亲自起草中央电报，电文还专门提到了“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就是一个后话。当时毛、周、林频频联络商议，中央反复和慎重研究对策，不是一个林彪就可以个人决定的。陈再道之说事出有因，的确有周邀人进京之说，但仅仅是一些开始的主观设想，并非中央认可的万全之计；周恩来回到武汉，中央统一的决策意见势必已逐渐形成。以上说法，是林彪死亡以后，才普遍传开和反复强化的说法，似乎是一个林彪破坏了周的正确

决策。这难以是真实的和主要的历史，也把问题过于概念化与简单化了。

另一个旁证是20日当晚，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46）的副主任纪辉召集会议，拟出一个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47）当天，“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在忙乱中正布置全面夺权，形成既成事实，再讲其他的，主意也是非常确定的，他们并无进京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要求。武汉事闹开以后，在1967年群情激愤，左倾思潮抬头的大势下，邀请“百万雄师”的人进京议事难以实现。不论军区领导与周恩来的设想如何好，当时实际上不具备在京心平气和谈问题的任何条件。

后来，听刘丰汇报王力已经在8199部队找到，周恩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当事人回忆，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于是，周决定中央代表团立即返京，策划了一行人着空军军服，在空军部队掩护下，半夜去山坡机场。恩来不辱使命，行前一阵轻松；他同北京全体来员在百花一号一块吃了晚饭，又让北航井冈山、吴介之同学陪着他去湖边散散步（一号就在湖边）。他们一老二少在湖边谈了半个小时，为证实此事的真伪，笔者专访了后被胡耀邦特许上研究生、今日已是一个企业老总的井冈山，他至今还记住的，是总理谈武汉事件的一段话：“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48）这就是周当时对事件严重性的认识。周恩来在事后的沉重和难受，不需我们再妄自猜想和阐发了，只希望一切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尊重业已辞世的周恩来，体谅他复杂的感情、尊重他的人格，尊重历史。

按说，周恩来对于当时受到中央压制的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力抵制与反弹，早在内蒙问题处理过程中已经有所体验。7月4日他在接见河南问题会谈军队干部时就谈到：“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八九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5月下旬，内蒙军区有干部和战士，抵制中央对问题处理的意见，组织人员到京请愿、闹事，在政协礼堂起哄，殴打军区政委吴涛（在呼市还扣押、殴打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鼓噪要走。周恩来曾生气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厉声说“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谁走就让他走”！（49）制止事端，并下令逮捕肇事者，与军委领导商量处理内蒙军区问题。他对抵制中央推进文革的思潮和极端行为不是没有感触与准备，但没有估计到武汉事态竟会恶化到这一步，甚至当着毛、周的面！

按总理的亲自部署，7月22日凌晨3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总理、谢富治一行，也在空15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空军干部听说总理已经几天没有进餐和洗脚了，十分心疼，干部和飞行员、医生护士忙着打水送饭。很快，周恩来又出去接见了护送两支车队的空军指战员。（《东湖风云录》，P267）是这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直奔机场。大卡车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因而一路上“百万雄师”的武装人员掌声不断，欣然放行。周、谢和北京来人一行顺利到达山坡机场。

应该说，对于王力，当时周是一片真情的，一个是出于危难之中的同志情谊，另一个，也

是痛心武汉问题的解决未料到出现如此曲折磨难。周对王力的认识，到8月上旬未曾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回京以后，邓颖超携主席塑像去钓鱼台看王力，江青不快，说“统一战线统到中央文革来了”！也非偶然。

凌晨5点，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集李作鹏、军区孔、叶、空军刘丰，等负责人开会，要孔庆德中将（军区党委常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咐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才好讲话（周有心要让陈、钟下台阶；陈再道回忆说周没有责备军区）。又交待武汉空军仍为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周亲自部署和调动部队，稳定武汉局势。于是武空命令空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第44师赶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决定马上派空降兵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当晚，部队就进入了几个预定位置。几天后，人们才知道周恩来亲自在武汉各要害部位部署了支左部队。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不过，周叫谢、王先走，说“我要把陈再道叫来，把抓走的两个记者放了就走”（《东湖风云录》，P267—269）。原来，被拉走的《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驻汉记者还未找到；周恩来临回京前仍惦记着这件事。作为参考的是，20日周恩来临赴武汉前夕，在京亲命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事件情况，郭某与张某于21日深入水院和武大调查，并向北京紧急反映了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50）。周与谢、王回到北京，中央广播消息以后，武汉和河南的形势依然十分紧急和复杂，25日凌晨，周恩来还命令驻扎开封的7249部队（空15军的43师）靳师长：“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他的秘书，也正在郑州群众之中。而且，由于24深夜日大批“百万雄师”围攻体育学院、测绘学院，空15军部队立即前往制止，周恩来于次日11时再电制止“百万雄师”孤注一掷，“百万雄师”才撤走了。

8199部队按当时的统一部署，加强军区和其他要地的警戒，配合了空15军在武汉市的换防与支左军事行动，其政委张昭剑回忆：在23日，军区副政委叶明将张找去交待任务时，拿出笔记本，把周总理对29师说的话念了一遍：“张昭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29师这个班子好，但部队不行，也上了街”（51）（按：指部分29师的战士，也参加了上街造反的行动）

肇事的8201部队，则在武汉军区的调动下，于中央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以后，陆续地也是井然有序地将城防、支左工作，转交给入城的空15军部队。

从陈再道的回忆《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看出，他到了22日早上，想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宾馆里周住处负责接待同志才告诉他，毛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的确，几天来被事态弄得晕头转向的司令员，对毛泽东的行止，对周恩来再回武汉来的活动和整个情况的变化，远远不如其他军区的副职领导清楚了。

五、回到北京与后续的风波

7月22日下午5点左右，周返西苑机场，先下飞机，参加了欢迎谢、王（报道中还有余立金）的队伍和仪式，谢、王受到隆重欢迎。当年新华社的新闻照片和新闻电影里，周恩来在机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手挽手的镜头，给世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晚上，他参加了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次日凌晨，周再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以中央名义召陈、钟，独立师师长、政委和市人武部政委进京。周恩来并代中共中央，亲自起草电文：“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可见，他回到北京立即参加和主持了事件的善后处理。中共中央调陈、钟等武汉地区军事领导人赴京，

是毛、林、周相商一致的。

据《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回忆：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还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词句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下八上短短的半个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回到北京后，连日来周恩来与毛泽东频频联系，也连续到林彪处开会，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常委扩大会，商讨有关武汉问题事宜，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对事件本身定性，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召集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些，杨成武的系列回忆和《周恩来年谱》也有所披露，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但是，从已经披露的史实和当年留存下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来看，周恩来到北京，已从“7.20”前后极度紧张和亢奋中转过神来，他对于武汉问题的提法转而比较低调。在全国群众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以为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是否他已经在反思许多重大问题？

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王回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周，中央文革、军委办公室成员出席。周恩来没有留下什么话语。当日，总理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武汉问题直接影响到河南），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参加会议的同志至今还记得，周恩来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陈再道和钟汉华听到总理严词，几乎当场瘫倒在地。但周的整个讲话还是平和的，并且批评了军委看守小组吴法宪批斗陈的粗暴言行。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开会。

武汉事件发生不久，中央文革办事组紧急通知“北航红旗”将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在京）“抓”回来查证与徐海东关系（是否与武汉事件有关）。张体学与北航的韩爱晶言谈，沟通得十分融洽，韩授意张给毛泽东写信表态，争取中央和造反派谅解。7月29日，周要求卫戍区要回北航揪去的张体学等领导；（此前）清华大学学生抄徐向前家，周也指示所有进入人员全部撤走，保证徐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安全、徐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要全部向清华大学全部追回。30日，将叶剑英关于26日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批示印发到参加会议的同志。后来，又命文革办事组通知北航退回在徐海东家抄走的物件。31日，请示毛泽东——积极安排受到批判冲击的老师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行车路线。这样，周恩来及时阻止了因追查“7.20问题”冲击原四方面军老同志。“八一”晚宴上，韩爱晶把张体学给毛泽东的信送呈周恩来。周对张印象本来就不错，一直在设法保护和选择可供湖北“三结

合”的革命干部，很快中央即让张回到武汉，准备恢复工作。9月19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就与军区新领导人问起张体学，要求军区做工作，让张得到群众谅解，多解放一些干部参加“三结合”。

此外，7月30日清晨，周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3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当日旋接见曾思玉、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这个重要活动，不是由林彪亲自通知和主持的；至于林彪到8月9日才接见曾、刘并发表重要训诫，曾、刘后来在武汉一再申明自己是林副主席派来的，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林彪发表重要的“八九讲话”时，周恩来也和其他中央领导在接见现场，这是一次集体的接见，只是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有简单插话。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讲话暴露了林彪处心积虑整治武汉军区和借武汉事件造势，是否符合历史与科学？

27日中央继续召开揭批陈再道会议，周恩来因有事，安排杨成武主持。是日深夜，周第三次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批评造反派参加抢军火。谈到武汉事件时说：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和独立师都带有臂章。“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它一个群众组织，可以教育（《周恩来年谱》）。查谈话原始记录，周说：“……我们原来也没有宣布要取消‘湘江风雷’的组织。‘百万雄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没有取消嘛！何况‘湘江风雷’呢？”此时旁边的戚本禹打断周的话，认为“百”不能与“湘”同日而语，一个保一个造。周才又接一句：“武汉乱，但是‘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钢二司就是钢二司，做坏事就明显；长沙赶武汉都赶不上……”从《年谱》引文和接见谈话记录看，周对“百万雄师”有保留的，尽管当时一片喊打，但他的调子不仅没有比“7.20”前提高，甚至低于他在7月18日的讲话。

不过他对各个地方的“革与保”的派别斗争，基本态度还与“7.20”前相同；同时，在“7.20”前后激化和蔓延的持枪武斗也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7.20”的这些后续风波，似乎使他退守底线，在苦斗和斟酌之中。河南、湘赣和边疆、沿海的一些事例充分说明这点：

7月28日，周恩来为制止乌鲁木齐市武斗给新疆军区发出指示：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给南梁地区（按：造反派被围困）送面粉。当日，周与姚文元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他提到：“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对江西联络总站说：“你们这边偏保，保守一些，还是群众组织，只要你们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存在，还可以发展。就是被个别坏头头掌握了，也可以离开他。你们偏保，造反精神不旺，对我的话就不满意，其实过去你们就是受军区的影响嘛！就是偏保嘛！你们要改过来，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欢迎，支持你们，但可不要起来打砸抢，如果搞打砸抢就更错。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我的看法刘培善同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说对不对”？但是，在江西群众代表谈到武汉“百匪”时，他要求不要这样说话，共产党光明磊落，不要骂人。

在21日，第七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康生曾极其失态地骂“百万雄师”是“白完行尸”；周却说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30日）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周恩来就提到武汉：“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

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市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周恩来在两次对河南的讲话里，都突出了政策问题，要求造反派正确对待群众，他担心得到中央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并不能理性的掌握正确对待群众的政策。

凭借处理武汉事件的东风，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中顺便点了全国各地一系列造反派的大名，以事件为“试金石”，全国“革与保”两大阵线顿时泾渭分明。不过，受到中央表彰与支持的造反派群众并非人人明理、争气，“保守派”们自然也不服气；一些地方的情势发展，本质上就与武汉一致，中央当时仅仅希望借解决武汉问题以推动周边，却严重低估了一些地方、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对解决武汉问题的逆反心理，低估了也可能出现的反弹。从中央的宣传上，人们似乎看到湖北周边地区革命造反势力的高歌猛进，实际上许多地方根本权力与利益的冲突和“革与保”的冲突反而被激化，持不同见解的部队甚至公开冲突，分别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乃至发枪），有的地方则是造反组织内部急剧分化，持械武斗。在这个全民全军的多方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的积极参与下，除湖北、河南、湖南和12军进驻的安徽外，一些省局部形势顿时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别的不说，就武汉刚刚翻身的三钢造反派，居然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专县乃至全国“武装支左”，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一些中央领导的臭骂。

这时候，中央高层业已对群众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产生强烈忧虑，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的问题，但毛并不认同。王力回忆说：“林彪在此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前面说形势很好，后面主题是夺枪问题很严重，必须发布命令禁止夺枪。毛主席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前面说同意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他不同意后面林彪关于夺枪的话。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他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着重分析多么严重！他原来说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队，现在说部队主要领导骨干支持右派。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装。……毛主席8月4日的信，5日林彪主持会，就要贯彻执行，周总理也参加了。老实说当时大家都懵了。但都得表示拥护，都得这样作”。（见《王力反思录》P266—268）后来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针对广东严禁夺枪的通告，周批给文革碰头会准备发出，后接受意见（怕与毛的判断“夺枪问题并不严重”相左），叫广东先试验一下，而且强调对劳改犯夺枪，部队可以开枪。（见《王力反思录》P1013）由于情况认识不一，周恩来要求全军文革小组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上报，并约三军负责人和南京、沈阳军区领导谈话。

8月5日，在天安门纪念《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上，针对蒯大富和全国许多造反派认为的处于第三次大串联阶段，周恩来明确指出这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同日，他第六次接见江西几方并谈话。次日，周接见湖南群众代表，严肃地批评了乱抢枪乱夺枪是非法的，“解放军支左犯了错误，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军部队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发展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行为，已引起他的密切注意。

6月以来，江西的武斗比武汉更加激烈。在7月底和8月上旬，周恩来频频接见军队干部和群众，处理江西问题。当时，一方面要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发枪支“保”，要制止抵制调入支左

部队甚至围攻殴打部队，哄抢他们枪支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劝阻和制止得到中央支持的造反派抢枪反抗和围攻保守派的行为。本来，周恩来接到江西告急电，在京西宾馆主持军委扩大会议，由文革办事组电告江西制止抢枪；但与会人员刚刚回到钓鱼台，毛泽东的批复已经发来，为什么军分区可以向保守派发枪，我们不能武装左派？（52）（7月18日，毛泽东谈话里就有“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给江青的信也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并在文革碰头会中传达）。结果该会议的精神未有真正执行，周恩来也只有维持武装左派的总体意见，并写入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所以，在关键的8月上旬，周没有能够扭转他业已警觉的倾向问题。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按照中央自7月以来的分析思路，依然批评“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而且在文件的最后，提出：“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同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文件对军区犯错误等问题的基调，还是与以前一样；也是借处理武汉问题，解决周边各省相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毛泽东修改的该文件承担了中央在湖南问题里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周恩来与王力在武汉曾谈到的问题，张根成当即电办事组查文件。

也就是这一天，中央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强行维护交通秩序。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国准备分省和军区办武装干部的学习班。周恩来首先落实办湖北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武汉军区和鄂、豫省军区的领导干部进京学习。当时，毛对王力看法甚佳，还要王承担办班组织工作。8月12日，周恩来到京西宾馆接见武汉地区军队领导，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请你们到北京来，一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二是要你们好好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谢富治、吴宪法、王力参加接见并有讲话。

要特别强调的是，11日白天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周恩来有一段很长的话涉及到武汉问题和正确对待解放军。他说：“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

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可以看到，8月11日周的这次关键的讲话，重点已经在于引导红卫兵，不要到处抓陈再道，搞乱军队和形势。基调是稳定秩序稳定形势，要首都红卫兵带头。从目前可以看到的公开讲话记录看，基调在11日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文革小组的陈伯达也宣布：被坏人操纵利用的“5·16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就是）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这）是以“极左”手法欺骗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阶级敌人歪曲“文攻武卫”的口号到处挑起武斗，要反对。看来，周恩来与文革小组业已取得了一致，文革运动首次公开提出反对“极左”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的问题。

8月12日晚，周恩来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发表讲话，“首先，刘培善同志对江西省军区所犯的的错误要负责任，要检讨，他作书面检讨，…明天和以后也不要在北京开什么大会，把某些同志揪去进行斗争，因为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是最高指示，希望你们按十六条办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这里，周再次强调了政策与纪律（也吸取了批斗陈再道的教训）。周提到“原来中央决定把（抚州）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独立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调动，这是已经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违抗命令，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负绝对责任，如果他们对抗中央、中央军委，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抚州部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的。我们相信，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包括人武部，还是一分为二的，多数还是好的”。江西问题的处理，直接受湖北武汉的影响，而且周还提到陈再道的教训（当事双方也都看着陈的教训）。但他肯定了地方部队、人武部的大多数。

到中甸，毛泽东对《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提法，对中央7月27日给武汉市军民的公开信提及“军内一小撮”不满，对林彪送审的发全军文件提及“揪军内一小撮”不满，但具体时间和批示，至今未正式公开，王力回忆说是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53）；别人说法不一，需要考证。（54）毛泽东的新精神立即传回北京，并传说“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故有文革小组追查给武汉军民的公开信原文修改和付印时出现“军内一小撮”的事件。据说原来毛审阅稿无此语句，是王力在付印前加的；王力自己也记不起来了，还和关锋到办事组大发脾气；工作人员从中办调来原件，正是王力所加，才说“搞清楚了就行，不要大惊小怪的！”尽管这个提法本身并不新鲜，但钓鱼台得知毛泽东的不满，精神已经十分紧张；康生与陈伯达忙于洗刷自己，抛出王、关。江青还专门考问秘书阎长贵，要他看“社论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周对于各地抢枪风和军队搞“四大”极度不满，一再表示出来：

16日，周恩来对浙江省军区发出电话指示，指出“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嘛！敌

情第一！浙江的沿海蒋介石很可能搞乱子，你们要提高警惕”。“省军区直属机关搞四大。司、政、后直属学校可以搞四大，文工团也可以搞。军队不能搞四大，军委早规定了，军以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用发扬民主的方式提出批评，不能用四大的形式”。“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不能搞四大。但是，他们有权批评省军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送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进行讨论。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部队不能乱，部队一乱，就不能作战了”。“对二十多县来的造反派要动员他们回本县闹革命，通过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他们，使各地方军分区、人武部的态度明朗起来……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队不要串联，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你们可以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关起门来搞四大，不要把秩序搞乱了，部队秩序乱了对敌人有利。杭州湾、浙江沿海敌人很容易钻空子，你们也可以设想设想”。

到21日，周恩来就厦门某海军基地十艘军舰武器被抢一事指示陈伯达：“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他对日益严重的抢枪夺武器，已经极其不满，对群众组织的批评口吻已经非常严厉。

同处于边防前线的广东，抢枪与武斗严重。在14日，周就广州治安和冲击机场、抢民兵枪支问题，批评群众，要有敌情观念。到22日凌晨，更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质问题，接见广州两派代表说：简直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慎重其事地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当晚，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周恩来于23日凌晨紧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对火烧事件和外交部夺权，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并针锋相对地说：“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在北京出现的文革危机，使周恩来多日来对全国出现危机的忧虑和愤慨，聚集形成了整体的认识：运动要触礁了！所以对外事口群众又说：“‘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可见，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事件”后引发的负面问题和后续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向群众公开表述了自己的意见。

不过他对造反派群众依然热忱如前，依然维持着毛泽东要武装左派的意向，将领导负的责任、运动中的错误倾向和群众本身区别开。如：24日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和解放军报记者，仍然提出：广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为核心首先联合起来。……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2—3万人，双方签订的四项协议是靠不住的”。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总”、“春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交红旗”、“红旗工人赤卫队”可以争取”。同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广西双方代表，一开始就谈到：很久不见你们了，两个月了，最近很忙。你们“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4·22”），看你们怎么办？！“4·22”的同志，文革给你们的电话知道了吗？（要上交援越抗美军事物资）你们比较听话，办得比较快。还有一部分没有收回是不是？！

周恩来在7月22日回到北京之后的七（月）下八（月）上，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处处提到批判陈再道、“百万雄师”，更没有说过头的气话，涉及武汉问题的基调是较低的。面对“揪军内一小撮”狂潮，抢枪成风，以及北京运动中外事口的严重问题，他非常忧虑和气愤，他正在冷静地观察和抵制走向狂热的运动。同时，他在涉及外地一些问题解决和突发问题方面，基本认识和态度依然与“7·20”以前是一致的。武汉事件的善后工作，一直在他的主持下进行，诸如组织对陈再道等的内部批判和认真保护，落实毛泽东对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指示，主持

起草、签发有关中央复函、文件，调配和组织新的军区领导班子、指导武汉运动进展、组织军队干部学习。而且这些活动都与在上海的毛泽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高度统一，维护着毛泽东的意见和威望。

对于武汉革命群众，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帮助、爱护的积极态度。要求他们在中央和全国的支持下，不要头脑膨胀，要掌握政策，团结群众，发展大好形势。他对群众造反派中一些代表人物的情感是真诚和原则的，这一基本倾向，在10月份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到武汉时，多次与群众代表亲切恳谈，也一再表现出来。

六、总理两次接见武汉群众

在8月，他两次接见武汉群众代表。一次是8月9日，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宣讲形势和政策；曾思玉、刘丰，15军正副军长，29师政委，空军，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等参加。

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根据讲话起草了一个较为平和与积极的纪要，回汉向群众公布：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总

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

.....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决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枪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零”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

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8月8日，是周总理命令空军飞机接武汉群众代表进京，组织了这次接见。具体到这种小事，周亦躬亲，可见这次接见在周恩来武汉运筹中的位置。但是文革以后一些回忆（特别是陈再道的回忆）与某些描述，谈到这次讲话是中央文革小组搞的，是搞乱武汉的。据参加该次接见的群众和部队的人回忆，此纪要稿主要是按周恩来讲的原则乃至原话写成的。陈再道的回忆则认为，是陈伯达、康生等接见了造反派，讲话，而纪要居然是“这些‘中央首长’”的讲话内容。目前没有听到这次接见谈话的现场录音，所以两种矛盾的看法，有待进一步弄清。不过陈毕竟不是当事人，并未参加此次接见，他颇带个人情绪的回忆与认识能否作为信史之佐证？需要一切热心历史研究的朋友有个估计。历史地看，以上谈话精神的基调是保护军队，要求团结多数、大联合，要稳定的。

周的另一次接见是8月26日，从23时到次日零点多，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仅是几个联络人员，非造反派头头），强调不能把形势搞乱，要支持军区领导，要团结，武装左派，但不能乱抢，不要全国乱跑出坏主意，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的问题，做政治工作。其实，当天中午杨成武从上海回来，转告毛泽东的指示；周先去林彪处面商，后又召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开会。之后，才来到接见群众现场。神色凝重的周到场，谢、王已经对群众说了半个多小时。当时记录如下：

总理：现在搞出来了一个“新武汉”，知道吧？这是个新问题。

王力：三钢的同志刚才说他们不同意。

谢：搞得不对，听说三新支持的。这么搞，三新的威信就会降低的。

总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夺枪的问题。武装问题不能乱抢。武装左派嘛，我们说了嘛，为什么又要抢呢？

王力：随便抢枪，你们自己又不能掌握了，坏人也可能去抢。难道内部没有坏人吗？自己的敌人往往被派别斗争掩盖了。

谢：要顾全大局，全国都在支持武汉，你们把武汉搞糟了，就辜负了毛主席。

王力：总理提了两个问题，“新武汉”，夺枪。刚才还说了一个不要到全国串连的问题。

总理：今天主席又说，出去自己以为出好主意，其实出坏主意。出去也许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往往帮了倒忙。武汉很多事要做的，不要到外头乱跑。

王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百万雄师的问题。

总理：听说现在武汉出现了对百万雄师的头头挂黑牌的现象。上次对你们代表讲过的，第一政府不抓；第二左派也不抓，让他们自己组织和群众处理。这个法子是最好的。前些时，百万雄师就有人反映又不抓，又不斗，这个办法最厉害。

王力：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两个办法比一比，你们说那一个厉害？他们不怕你带黑牌子、游街，就怕你搞政治工作，就怕你们不脱离群众。……下面组织发生了问题，要及时解决和教育。听说二司有很多人到沈阳去了解曾思玉同志的情况，还搞绝食。

总理：二司代表去了多少人？沈阳代表对我说，在那里搞得很乱。

王力：我们打电话去有三条：一是都回去，二是矛头对准沈阳军区是不对的，三是调查曾思玉同志是不对的。曾司令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去的。

谢：应该好好搞大联合。

（要开会了，首长与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对新华工代表说：你们回去要搞好大团结，大联合（新华工代表说：我们内部意见争论很大）。哦！你们内部要搞好团结，你们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组织。过去患难中能够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希望你们胜利后，也能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这是武汉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小礼堂面对军队领导同志的中央“三人物”，最后一次集体接见武汉群众的谈话；“武汉事件”中的英雄王力，因“揪军内一小撮”宣传问题处境已经十分艰难，还坦然地与周一一起教育武汉群众。王力当时不知道，谢富治也不知道，群众代表更不可能知道，周恩来刚刚面见过林彪，再向中央文革小组的陈、康、江传达了（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即把王力、关锋抓起来。据杨成武的口述回忆，他在8月25日凌晨记录了周恩来关于全国16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和处理意见，记录了周报告外交部运动和火烧英代办处问题，周担心连锁反映（应），“现在一个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个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杨即去上海，向毛泽东转交了周的意见和王力“八·七”讲话，带回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参见《微行》）

7月下旬以来，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了武汉军区的改组，批判和保护了在“武汉事件”中犯错误的军队干部，指示了武汉地区党政军民下阶段文革运动的走向，批评了群众中业已抬头的无政府主义、极“左”狂潮，警惕和提出武汉事件后出现的极不正常浪潮，继而端出了“武汉事件”中的英雄——所谓“小爬虫”的王力，周恩来处理1967年7月武汉“七·二零事件”，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

这些实际情况，笔者是到今天坐下来读书、查资料，访问知情人，才开始去弄清楚的。因为在1967年8月，武汉事件的一些内情，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处理前后有关问题，的确处于保密状态；文革以后，关于事件的真相记载和评价传说，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越来越大相径庭，甚至大多数的文革过来人，几乎不知道周恩来亲自、主导处理1967年武汉“7·20事件”问题的历史事实，也并不真正理解他在该事件后，在文革进程出现重大转折时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了。舆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林彪和江青，甚至是王力的身上，这是对于历史极不严肃，对中共的创始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极不尊重，也极不利于科学地总结和吸取文化革命的深刻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3.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4. 徐海亮编著，《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注释：

〔1〕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当时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

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其简要介绍参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辑于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3〕《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

〔4〕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6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

〔5〕王力亲撰，1988年8月30日，现尚未公开。

〔6〕同注〔5〕

〔7〕见《周恩来年谱》下卷 168页。

〔8〕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9〕《王力反思录》1006—1007页，北星出版社，2001年。

〔10〕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本人回忆，2004年6月、10月；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177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1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27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

〔12〕《王力反思录》1005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

〔13〕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17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14〕见《口述“7·20”》，周的接话见《王力反思录》 1004页。

〔15〕参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参阅余汝信《“720事件”中的“8201”与“8199”》（2005年1月）。

〔16〕《王力反思录》 1006页

〔17〕见《口述“7·20”》，《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19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得知武汉出现变异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但一些人回忆的时间不确，顶撞总理不是在18日，而是在16日。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斗争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指责16日陈顶撞总理、拍桌子。

〔18〕见《口述“7·20”》考证、集录，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249、22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19〕《口述“7·20”》附录，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297—303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0〕《口述“7·20”》，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202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1〕《口述“7·20”》，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301—302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1〕《口述“7·20”》，见《口述“7·20”》附录，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21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2〕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202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23〕按：指15日到18日四次。

〔24〕按：这是几个月来，周恩来在掌握全国未夺权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情况，斟酌是否要军管时，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即湖北在某种意义上是军管了，但文革活动又在缺乏实质性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且形式上也未宣布军管。武汉军区是既有管理权，又没有运动引导实权。

〔25〕读：说到要害，表面上军区控制了形势，但两派群众对立极大；周也按当时的套话说

“乱的好”。

〔26〕读：有反复的是黔、黑、晋、鲁，这里的“邻近”是四川。

〔27〕读：总理一方面认真处理各省问题，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按当时处理文革纷争的认识和方法，会有反复；不过讲的反复，还是干部和群众的局部性认识反复，还不是出现剧烈冲突和大规模抵制中央。

〔28〕读：周认为军区领导有错误，是关键的，而认识了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全省运动；文化革命，人们犯错在所难免，但认识和改正，还可以前进乃至先进。周打从内心是这样期望武汉军区的。

〔29〕按：周的是非所指和倾向性应是明确的。

〔30〕读：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应当与中央汇报和知会、请示和批准；不过中央也未太当成事，认为对群众的问题出现随意处置，对文革开展有激进思潮和守旧思潮，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31〕读：认为“百”的产生发展，军区指导思想和倾向有问题。

〔32〕按：军区一直追索一个虚幻的口实，指责“工人总部”死保公认了的走资派王任重，犯了错误。在当时的汇报中，还将其作为主要理由，反对工人总部翻案。

〔33〕（下答：抓办搞的）按：根据陈再道的检查讲话，周恩来还有一段话未记录下来：“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34〕读：周这里全面概括了他介入武汉问题以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他对武汉局势变化和激化心里有数，将问题归咎于军区的责任。但这里也明显地把“百万雄师”看成犯错误、对激化冲突有主要责任的群众组织。

〔35〕读：周恩来这里说明了，从军区一开始去组织批判群众的一个声明入手，抓人，几个环节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造反派群众有气，就要打倒陈司令，抓武老谭；而同时中央处理河南问题对武汉有影响，这都是实际情况。

〔36〕按：总理讲了一个原则，也是当时各地很难做到的；这里周还高姿态承担责任。周说的“指名”还不是指武汉，而大概是指湖南“湘江风雷”处理，王力在当晚就当众人的面接毛泽东的话，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这里说湖南影响湖北，也是做自我批评，给湖北问题下台阶。

〔37〕按：7月18、19日，军区的当务之急是着手总理要求的这个工作；陈、钟由于思想不通，没能也不可能把握总理的教育转化要求与机会。

〔38〕按：这条是引导群众组织，要自己区分言行的正确与错误，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也是批评了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

〔39〕《口述“7·20”》，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260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40〕该回忆辑于“亲历者的口述——民众心中的武汉‘720事件’”，徐海亮，《东湖风云录》，P247，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41〕《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2〕徐海亮，《东湖风云录》，253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43〕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43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44〕《王力反思录》1009—1010页。

〔45〕当事人（原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澄清事实真相，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46〕该“抓办”即“百万雄师”的幕后组织操纵者。据陈再道的检查讲话，7月18日周恩来在军区总结讲话，问是否人武部是“百万雄师”的后台，下面军区干部答“是抓办”；接着还有一段话未用文字记录下来，即周说了：“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47〕徐海亮，《东湖风云录》，256—257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48〕徐海亮，《东湖风云录》，260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49〕7月4日讲话见河南问题的第5次接见文献；此外，5月内蒙军区战士起哄，张根成

在场维持会场秩序。内蒙问题的背景参阅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50〕见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载“百年潮”，2002年第5期。并综合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有关负责同志与被派赴汉记者回忆（2005年7月、8月采访）。

〔51〕当事人（原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澄清事实真相，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52〕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回忆（2005年9月）。因皮定钧电告中央，江西抢了百余条枪，嵛、何接电起草汇报；上午，周紧急召集康生、张春桥、杨成武、韩先楚和王广宇等开会，商议起草电报，批评军区和造反派。该电也按惯例以要事汇报形式呈上海毛泽东，毛中午即批复。戚本禹问他们为何匆匆发电批评江西军区和造反派，说毛有批复。

〔53〕《王力反思录》，1014页，北星出版社，2002年。

〔54〕《微行——杨成武在1967》说是在8月14日，待考。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